

—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

五四前後^的 女性解放話語



NOR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挪威名劇作家易卜生及其筆下「娜拉」形象在五四前後被譯介到中國，其作為五四啟蒙話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張春田 著

—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

五四前後的 女性解放話語

張春田 著

新銳文叢32 PG0947

新銳文創
INDEPENDENT & UNIQUE

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

——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

作者	張春田
主編	蔡登山
責任編輯	劉璞
圖文排版	王思敏
封面設計	王嵩賀

出版策劃	新銳文創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圖書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2-8227-5988 傳真：+886-2-8227-5989

出版日期	2013年4月 BOD一版
定價	24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 /
張春田著. -- 一版. -- 臺北市：新銳文創, 2013.04
面；公分. -- (新銳文叢32；PG0947)

BOD版

ISBN 978-986-5915-70-4 (平裝)

1. 五四新文學運動 2. 中國當代文學

820.9082

102004647

自序

通過「娜拉」重探「五四」

作為五四啟蒙話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而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及其筆下「娜拉」（Nora）形象的被譯介到中國，在五四前後發揮了特殊的推動作用。在中國新文學尤其是現代戲劇的創制中，也有重要價值。無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娜拉」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存在。本書從思想史與文學史的視野去討論「娜拉」對於五四乃至整個現代文化想像的意義。

本書追蹤和重構「娜拉」跨語際進入中國，被傳播、被言說、被模仿的歷史與文化語境。在此基礎上，考察圍繞「娜拉」的女性解放和個人主義話語的展開過程，「娜拉」譜系在不同話語場域與文類形式中的嬗變情況及其社會文化內涵，分析它們如何受到現實環境、性別差異、對話機制的影響與制約，探討作為話語實踐的「娜拉」故事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內在關聯。

第一章，首先梳理易卜生在1910-20年代被翻譯到中國的情況。一系列紙面的知識生產和舞臺的話劇表演，逐漸建構了易卜生在現代中國的獨特位置。接著討論五四時期促使「易卜生熱」生發的歷史語境。從思想革命、戲劇改良、寫實主義等角度，揭示選擇易卜生的文化邏輯。易卜生能夠被五四知識者選擇作為文化資源，因為

他正好契合了五四文化精英們的期待視野，提供了他們能引以為用的象徵資本。「易卜生熱」是五四的知識／權力機制的具體體現。最後分析《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在跨語際過程中的翻譯的政治和接受的可能，試圖回答「娜拉」成為文化偶像的原因。在五四啟蒙話語中，《玩偶之家》反思現代性的面相，被對於現代性的渴望與設計所遮蔽並且替代了。

第二章，討論五四啟蒙語境中的「娜拉」闡釋，並延伸至知識者關於女性解放的反應，藉此把握五四啟蒙話語的主導傾向及其內在縫隙。「娜拉」成為社會話題，與《新青年》所創造的輿論空間密不可分。第一節回到《新青年》現場，論述女性解放話語在《新青年》中的展開情況。女子問題與對家庭—宗法制度的全面批判有著密切關係，這構成了中國女性解放話語興起的特殊背景。第二節聚焦於胡適（1891-1962）的〈易卜生主義〉，具體分析女性解放與個性解放是如何「接合」到一起的。「易卜生主義」是「逆女」與「逆子」結成同盟的標誌。女性解放話語被啟蒙的宏大敘事所整合並分享，事實上造成了某種「去性別化」的效果，遮蔽了女性自身的性別意識和自覺。第三節圍繞現實中的幾個「娜拉事件」，討論知識份子們在女性解放問題上的態度和觀點。知識份子們開創了一個言說和討論女性問題的公共空間，並且在話語實踐中，參與了理想性「新女性」的創造。在交響喧嘩的多重聲音中，知識群體的分歧和啟蒙的內在裂隙也日漸顯現出來。第四節關注「娜拉型」話劇。作為中國化的「娜拉」的文學再現，它們組成了中國的「娜拉」譜系。「出走」在「形式的意識形態」層面的意義，是解讀的重點。「田亞梅」們的「出走」，表徵出作為女性解放運動「引路人」的男性知識份子們的

現代想像與性別焦慮。

第三章主要論述五四高潮過去以後的1920年代裡，知識份子和大眾媒體對於「娜拉」的進一步闡釋和女性解放的繼續追問。第一節關注魯迅（1881-1936）。魯迅提出「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顯示了他與主導的啟蒙話語之間的區別。借助於言說「娜拉」，魯迅反思了啟蒙思路在中國改造方式上的樂觀想像，而《傷逝》中的愛情滅亡之路也對於啟蒙理性構成了深刻拷問。正是意識到改造的極端困難，難以相信簡單的進化思路和群眾崇拜，魯迅才選擇「深沉的韌性的戰鬥」。第二節討論周作人（1885-1967）在女性解放問題上特殊的倫理關懷。周作人以一種曲折的方式，介入到「娜拉」道路的爭論中。從「女人的發見」到「為女的自覺」，周作人始終強調女性自身的主體地位和內在自覺。他為自己的定位是「火炬」的傳遞者而非「解放者」。第三節以《婦女雜誌》的變化為例，從「第四階級女子問題」的提出，透析女性解放話語本身的流變播遷，即逐漸從五四的個性解放話語體系中脫落和分離，開始和無產階級革命動員重新「接合」。第四節分析由闖入文學創作領域的「娜拉」們自己講述的「娜拉」故事。她們的性別書寫打破了男性作為敘述者的絕對主體性，發聲於五四女性解放話語之外。無論是周氏兄弟、眾多女性作家，還是《婦女雜誌》的作者們，他們關於女性解放的討論，都直接或間接地加入到了「中國如何現代」的文化想像之中。

結語部分簡述了「娜拉」故事在1920年代以後的一些「續集」。標誌個人覺醒的「娜拉」，被收編入整一的國族敘事，最終作為左翼革命動員的象徵，昭示走向工農大眾的道路。這種轉變看似激烈，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伏筆。作為「民族寓言」的「娜

拉」故事，極為深刻地揭示了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主體詢喚機制，與此同時，也發出了質疑和批判之聲。可以說，「娜拉」問題所指向的正是「中國現代」的多重難題性。

目次

自序 通過「娜拉」重探「五四」	i
導論 「娜拉」與五四現代文化想像	1
第一章 「娜拉」進入中國：跨語際的文化偶像	11
第一節 易卜生的被譯介	11
第二節 選擇易卜生：知識生產的文化邏輯	26
第三節 《玩偶之家》：翻譯的政治與接受的可能	40
第二章 闡釋「娜拉」：在五四啓蒙話語中	57
第一節 《新青年》輿論空間中的「女性解放」	57
第二節 「易卜生主義」：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的 「接合」	67
第三節 現實中的「娜拉」事件與知識者的衆聲	78
第四節 「解放」如何表述：「娜拉型」話劇中的 「出走」	92

第三章 「娜拉走後怎樣」：女性解放的繼續追問	103
第一節 從娜拉出走到中國改造：魯迅的思想光譜	103
第二節 「女人的發見」：周作人的倫理關切	119
第三節 「第四階級女子問題」的提出： 《婦女雜誌》的變化	129
第四節 在啓蒙敘事之外：「娜拉」們的性別書寫	141
結 語 後「五四」與作為「民族寓言」的「娜拉」	151
附 錄 《玩偶之家》在中文世界的傳播表 (1918-1948年)	163
參考文獻舉要	167
後 記	177

導 論

「娜拉」與五四現代文化想像

作為五四啟蒙話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¹，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而挪威作家易卜生及其筆下「娜拉」形象的被譯介到中國，在五四前後發揮了特殊的推動作用。早在1925年，茅盾（1896-1981）就對此深有感觸，他這樣論述易卜生的影響：

¹ 「五四」作為思想史與文學史研究中的斷代詞，近來受到了不少批評。比如賀麥曉（Michel Hockx）就主張告別「五四文學」這個概念（據其2007年4月13日在北大中文系所作演講「文學史斷代與知識生產」）。在論文中，我仍然使用「五四」來指稱從1910年代中期《青年雜誌》創刊，到1920年代中期的「科玄論爭」之間的歷史時段，也依然堅持以「五四」作為這段時期思想文化狀況總稱的可行性，比如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915-192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但是，五四「主聲部」和「眾聲喧嘩」的緊張關係，也是我關心的問題。張灝的〈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原載《開放時代》1999年三、四月號，收入氏著《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為關於五四複雜性的討論提供了很好的起點。而在一戰之後的世界背景中看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參見汪暉：〈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易卜生和我國近年來震動全國的「新文化運動」是有一種非同等閒的關係，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專號」，曾把這位北歐大文學家作為文學革命、婦女解放、反抗傳統思想……等等新運動的象徵。那時候易卜生，這個名兒縈繞於青年的胸中，傳述於青年的口頭，不亞於今日之下的馬克思和列寧。總而言之，易卜生在中國是經過一次大吹大擂的介紹的。²

而陳望道（1891-1977）在1926年也論及這股文藝風潮的影響：

易卜生底《娜拉》、《群鬼》等關於偶像破壞的文藝，當時也多輸入進來。凡自稱為覺醒分子的，不論女子或男子，可說沒有一個人不曾在這等文藝的及非文藝的——即當時所謂新文化的文字上注目，留心，乃至筆述，口說。投入潮流游泳的數目之多，為有史以來所少見。³

的確，在1918年6月《新青年》雜誌推出精心設計的「易卜生專號」，刊載胡適與還是北大學生的羅家倫（1897-1969）合譯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三幕劇以及胡適撰寫的〈易卜生主義〉等文之後，那個「砰的一響」的關大門聲極大震動了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娜拉毅然離家出走的影子迅速風行全國，成為了集中多重含

² 沈雁冰（茅盾）：〈譚譚《傀儡之家》〉，《文學週報》第176期，第38頁，1925年6月7日。

³ 陳望道：〈中國女子底覺醒〉，《新女性》第1卷第9號，1926年，第639頁。

義的精神楷模與典範。藉由這個典範，五四知識份子找到了思想啟蒙的興奮點和「人的發現」的突破口；女性解放的討論在各種大眾媒體中進一步展開。很多女青年也以娜拉為榜樣，為自己掙脫家庭鎖鏈的行動辯護，「到處有人在家庭裡真的做了『娜拉』」⁴。

在中國的接受語境中，「娜拉」負載了女性解放與個人主義的雙重訴求，同時與反抗禮教、重估傳統、倫理重建、社會流動、自由戀愛、現代日常生活等有效地關聯起來，從一個側面呈現出五四啟蒙的「全息圖像」。知識份子借助於「娜拉」故事，自傳式地講述了他們從傳統的家庭—宗族共同體中走出，尋找自由空間的經歷。既確證了選擇的合法性，又表達了他們在世俗生活上的文化和倫理立場，以及對於國家—社會的合理化設計。所以，「娜拉」的出走不僅指示著個人出路的安排，還牽涉到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詢喚（interpellation）機制⁵。

但是，五四思想文化運動並不是單質的鐵板一塊。「態度的同一性」下面⁶，隱藏著知識份子們思路上的內在分歧。表現在「娜拉」的闡釋與更普遍的女性解放問題的探討上，胡適、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魯迅、周作人、茅盾等人

⁴ 碧遙：〈廿四年來中國婦女運動走過的路程〉，《婦女生活》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

⁵ 「詢喚」是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關於意識形態的傑出洞見。他提出，意識形態的功能在於把具體的個人呼喚（hail）或傳喚（interpellate）為具體的主體。參見〈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載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320-375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⁶ 關於「態度的同一性」的解說，參見汪暉：〈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思想中的五四運動〉，《文學評論》1989年第3-4期。汪暉認為，「五四」啟蒙運動在提出它的一系列基本命題的時候，已經存在自我瓦解的因素。

的關注重心和目標，就並不完全一致；在《新青年》、《婦女雜誌》、《小說月報》等媒體上，也是不同音調交響喧嘩，暴露出五四思想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⁷。五四以後，隨著歷史狀況的變化與知識群體的分化，知識份子取向的差異更加凸顯出來。他們繼續介入關於「娜拉」的徵引和討論，不斷進行著再解釋和再塑造。「娜拉走後怎樣」的追問，把女性解放問題帶入到一個更為廣闊、也更充滿爭辯性的空間裡。五四啟蒙的主導論述，這時受到了很多反省和質疑。從1920年代後期開始，在社會動員中，「娜拉」的喻義／寓意經歷了微妙然而重要的偏移和轉變。這種變化表徵出意識形態霸權的爭奪及其實現。

與五四啟蒙運動相伴而生的，是文學革命與中國新文學的發軔。在中國新文學尤其是現代戲劇的創制中，易卜生和「娜拉」也有著突出的價值。熊佛西（1900-1965）曾特別指出：「五四運動以後，易卜生對於中國的新思想、新戲劇的影響甚大，他對於中國文藝界的影響不亞於托爾斯泰、高爾基，尤其對於戲劇界影響至深。我敢說：今日從事戲劇工作的人，幾乎無人不或多或少受他影響。」⁸這種影響在戲劇界是如此全面而深入，以至於洪深（1894-1955）在編纂《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時，發出一番「影響的焦慮」的感慨：「在創作方面，有若干的作家，不僅是把易卜生劇

⁷ 余英時指出五四是多重面相的（multidimensional），也是多重方向的（multidirectional）。參見〈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入氏著《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第167-188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⁸ 熊佛西：〈論易卜生〉，《文潮月刊》第4卷第5期，1948年8月1日，上海文潮社。

中的思想，甚而連故事講出的形式，一齊都模仿了。」⁹從1919年胡適的《終身大事》開始，中國化的「娜拉型」劇作相繼湧現，熊佛西、侯曜（1903-1942）、郭沫若（1892-1978）、歐陽予倩（1889-1962）、白薇（1894-1987）、陳大悲（1887-1944）、曹禺（1910-1996）、夏衍（1900-1995）等都曾以劇作參與到「娜拉」文學譜系的構建之中。《玩偶之家》所開啟的「社會問題劇」，為現實主義戲劇風格的生成奠定了基礎。在1930年代又繼續為左翼話劇運動所借重，進而影響到20世紀中國話劇的主導走向。《玩偶之家》不斷被各種劇團搬上話劇舞臺，經久不衰。到1935年出現了一個演出高峰，這一年甚至被稱為「娜拉年」。

不僅如此，「娜拉」模式還越出戲劇文類範疇，在主題類型與敘事動力上，影響到新文學早期的小說創作。魯迅、茅盾、郭沫若，以及一批逐漸崛起的女性作家（如廬隱（1898-1934）、白薇、馮沅君（1900-1974）、丁玲（1904-1986）等）——她們其實就是進入寫作領域的「娜拉」），都曾書寫過這一主題，出現了一大批圍繞女性解放、愛情與家庭問題展開的「娜拉型」小說。「娜拉出走」的母題在小說中以多樣的方式，被重新表述與辯證¹⁰。「娜拉型」戲劇和小說，正好與關於「娜拉」的思想、知識論述構成了潛在的對話。凝定於文學文本中的情感和經驗結構，男女作者性別書寫的差異，表層性別主張與深層性別意識之間的分裂，對新女性困

⁹ 洪深：〈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第20頁，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初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

¹⁰ 張學美較為系統地討論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娜拉主題」（the Nora theme）。Shuei-may Chang, *Casting off the Shackles of Family: Ibsen's Nora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18-1942*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4)。

境的表現，等等，都極大拓展了女性解放的意義空間；並且為「中國如何現代」的問題，貢獻出豐富而獨特的文化想像。

由此可見，無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娜拉」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存在，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關鍵詞」。從思想史與文學史的視野去討論「娜拉」對於五四乃至整個現代文化想像的意義，正是本書所要處理的問題。「娜拉」打上引號，意在兼及人物形象（figure）和文化符號（sign）兩個層面。本書既要梳理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國的實際接受情況；又要分析「娜拉」鏡像所代表／表徵的女性解放話語在五四前後的流變播遷。限於本書的研究時段大致在1910年代中期至1920年代中後期，暫時放棄處理此後「娜拉」的轉義問題。

長期以來，或許因為學院專業分工的緣故，文學史與思想史研究似乎涇渭分明。在以往關於「娜拉」的研究中，思想史的維度相對缺失，沒有得到應有重視¹¹。很多從文學角度進行的研究，採取

¹¹ 關於「娜拉」與中國的問題，英語世界的相關研究著作，主要有Paul Vance Hyndman, *Ibsenism in China* (1968); Elizabeth Eide, *China's Ibsen: From Ibsen to Ibsenism* (London:Curzon, 1987); Kwok-kan Tam, *Ibsen in China 1908-1997: A Critic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 Transl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以及前所提及Shuei-may Chang, *Casting off the Shackles of Family: Ibsen's Nora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18-1942* (2004)。相關研究評述，參見許慧琦，〈書評：Shuei-may Chang, *Casting off the Shackles of Family: Ibsen's Nora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18-194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2006年9月），第241-248頁。中文世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兩本，一本是陳惇、劉洪濤編《現實主義批判：易卜生在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收入了大量知識份子關於娜拉的介紹與論述，以及相關論爭文章和序跋；另一本是許慧琦的《「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3年），從歷史

的是「影響研究」或「平行研究」的方式¹²。這樣的研究固然有其價值，然而，單一視角的一再重複，導致不少研究往往陳陳相因。即使在文學研究領域，對「娜拉型」文本的細緻解讀（尤其是「寓言化」的讀法）還遠遠不夠。何況，「娜拉」在當時媒體（如《新青年》、《婦女雜誌》）中是如何被呈現的？女性解放話語怎樣借重於「娜拉」的傳播而推廣？「娜拉」闡釋與啟蒙論述、社會動員的訴求之間的關係，以及這背後所牽涉到的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建構之間的緊張與互動，諸如此類的問題淹沒不彰，罕有論及。

現代中國的「娜拉」故事，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問題。如果忽視了文學實踐的歷史性（historicity），抽去了文本所處的歷史時空與思想背景，就難以完整描述和揭示「娜拉」的複雜性，難以借此體察和勘探中國的現代經驗。本書希望超越單純的文學史研究框架，通過引入知識份子的思想論述和大眾媒體的具體狀況，在

學的角度發掘大量報刊資料中的娜拉及女性解放話題，透析新女性形象在現代中國的變遷。

¹² 目之所及的這類成果中，值得注意的有：易新農、陳平原的〈《玩偶之家》在中國的迴響〉（《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這是較早研究《玩偶之家》在中國接受情況的論文。王忠祥的〈中國接受易卜生及其劇作史跡〉，從總體上考察了易卜生在中國的接受；何成洲的〈劇詩：易卜生和中國話劇〉發掘易卜生劇作中的詩性，並將曹禺、田漢與之進行平行比較；陳愛敏的〈中國「娜拉」形象觀照〉討論了現當代文學中子君、莎菲等形象。以上三文均收王寧編，《易卜生與現代性：西方與中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趙冬梅的〈被譯介、被模仿、被言說的「娜拉」〉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角度探討了「娜拉」的中國接受，認為被譯介到中國的伊始，「一個原本是易卜生『問題劇』中的文學形象也就必然會被賦予或承擔更多的社會內容」；邵錦娣的〈《傷逝》與《玩偶之家》：映照中的闡發〉比較了這兩部作品的近似。以上兩文收王寧、孫建主編，《易卜生與中國：走向一種美學建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